我們的欠缺

言止善

「爲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這就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這個問題值得你我他都來反思。筆者長期從事自然科學的教學，從一所科技大學退休，那「培養不出傑出人才」的原因，也能說出幾個來。

我們這個文明古國，講「師道」有上千年的歷史，但時代發展了，「師道」理應有與時俱進的修正。可是，如今你無論走進哪所學校，主流話語仍講爲師的職責是「傳導授業解惑」。至於現代教育倡導的師生人格平等、重視不同學生的不同潛質、課堂教育要多採用討論式等等理念，在踐行中看不出有多少分量。可以設想，像比爾·蓋茨、喬布斯之類的學生若走進我們的學校，是難討校長和教師的喜歡的。

「科學」是一個我們常用的詞，但到底什麼是科學（即了解什麼是「科學的本徵」），能回答出來的人恐怕不多。不少人總以爲科學必意味着正確，或者把技術當成科學。殊不知，科學是人類每一世代，每一個人，以自身有限的主觀認識能力，去認識外在無限客觀存在的一個永無止境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又總是後人發現前人認識上的不足、偏差，補充糾正前人的認識錯誤，修正推翻前人的錯誤結論而前進，而越加接近客觀眞實的。科學帶給人類的不但有各種合用的器物，更有璀璨的科學精神：「客觀的依據，理性的懷疑，多元的思考，平權的爭論，實踐的檢驗，寬容的激勵」。這六大要素，是任何一位科學家在他一生的科學活動、科學探索中須臾不可離，缺一不可爲的。

科學的魅力在於它難於捉摸，物理學諾獎得主丁肇中講，從事某項研究時他們會有個計劃，但最有價值的發現往往存在於計劃之外。李政道有句名言：「科學與藝術是一個錢幣的兩面。」一個人不論是在科學上，還是在藝術上（藝術屬於人文，也可代稱爲廣義的人文），眞正能實現其執著的追求，能達至輝煌的高峰，最必需、最不可或缺的關鍵要素恰恰是：自由的心靈，自由的意志，自由的思考，自由的探索和自由的表達。時下，誰要在我們高校來從事科研，頭一關就是「立項」（向領導說明你的科研多麼有用），此後要做的，就是設法在「結題」時應對好領導的檢查。科學研究如此運作，自由恰成爲了稀缺資源。

衆所周知，如今好多了不起發明創造是美國人，或者待在美國的外國人做出來的。那一方土地上，有好多相當不錯的學校。人家那裡，行政對學校的干預不多，至少校長並不和某一級行政官員掛鈎。待在如此學校裡的人，心靈便容易放飛。美國這個國家，的確有點怪，政府居然可以「停擺」（若一個人停止心跳，那多危險）。停擺的日子，總統也不必下台，不停了，他又像以往一樣神氣。

六十練拔筋

人生在線

張桂亭

題上的拔筋，是爲強身健體而作出的壓腿、劈叉等活動筋骨的動作。拔筋，我從壓腿開始。就像豫劇《朝陽溝》唱的「前腿那個弓，後腿那個繃」那樣子，雙手穩扶膝蓋，一下一下地用力往下壓去。這種壓腿熟練後，再練「正壓腿」：站在廣場上的一塊大石頭前，前腿高抬，穩放石上，雙腿繃直後勾起前腿腳尖，以適當的力度，向前和向下加壓。練到一定功夫後，腳尖漸漸地就能夠着鼻子尖了，又漸漸地能夠着額頭了，又漸漸地能夠着嘴頭了。對於這個「三夠」，小友們戲稱爲「跐着鼻子上臉」。我卻說：拿這句話說人，是有點貴人的負能量；說拔筋，卻是很給力的正能量！

但這個正能量的拔筋，確實拔得人背酸腰酸腿腳酸。有人說，這是自找苦吃。竊以爲，筋者，人之韌帶也。人，若以韌帶之韌而韌韌地拔去，那帶能不韌嗎？拔筋雖苦，但拔筋之後，一身通泰。俗話說，筋長一寸，壽長一紀。苦盡甜來，何苦之有！

再說練劈叉。十幾年來，天天都是壓腿熱身後，蹲下，雙手着地，前腳蹬穩，後腳慢慢地向後滑着劈成大叉。在地上坐穩後，上身前傾，頭夠腳尖，腰腿之筋一齊拔。有散步的老友看了我這個小心翼翼的樣子，打趣道：你啥時能練到像那些小青年似的，刺啦就劈下去了。我說：老年人劈叉拔筋，在戰略上要藐視：我還不老，我還能劈。在戰術上要重視：安全爲要，劈下就行。咱都這把子年紀了，太過強，刺啦一下，劈不巧，不是劈得筋長了，而是劈得長臉了！又有老友說：看你天天把條雪白的運動褲劈得都是土，多髒。我說：髒了一條褲子，得了兩條好腿，哪個合算？他笑了，丟下一句話：達人啊！余笑曰：達人嘛，自不敢當。但我相信，人老了，拔筋雖很難，但只要有個年輕心態，再鍥而不捨地堅持下去，就能練好拔筋。若以此觀去，人到老年遇到的很多世事，亦如此也。

坐輪椅的「一國兩制」

東西走廊

冰谷

我來說一說我出國乘飛機坐輪椅的遭遇；這種禮遇也像「一國兩制」：同是A航，給坐輪椅的殘障人在國內外兩種強烈的對待。

話說兩年前我們夫婦乘A航去沙巴。A航素以廉價著稱，也是它機票的賣點。我們從檳城國際機場起飛，在亞庇降落。我因爲中風行動不便，檳城機場登機距離近，我可以步行；可是亞庇下機到出機場關口要走很長的路，恐怕自己雙足不聽指令，於是要求輪椅代步。

我們是從網上訂票，要求輪椅要顯示OKU卡號碼，幸虧我早有所備，沒有問題。到了亞庇，蹣跚走下飛機，左等右等，沒有看見輪椅，詢問服務員，他叫我等等，理由人手不足。良久，輪椅來了，我坐上去，一邊搭腳板壞了，還推搪說沒有人推，太太沒法只得把手提行李放在我的腳腿，就這樣推着我上斜階，直到領行李處。

太太上前守望行李輸送帶，等待領取。這時忽然有位服務員走來示意叫我起身，他要推走輪椅，我說走出機場還遠。「沒辦法，我們輪椅不夠，有人等着要用。」也不等我同意不同意，就手抓輪椅了。我除了無可奈何，又想可能那位殘障人士比我更需要這張輪椅，心裡也釋然了。回程時也一樣，丟給我們一張輪椅，推輪椅的事自理。

另一次出國，去印尼棉蘭參加蘇北文化節，同樣乘A航從檳城起航。聽聞棉蘭的新國際機場很大，人地生疏，當然不能沒有輪椅。棉蘭新機場建在瓜拉南美，我步出機艙，就有一架輪椅等待，制服整齊的服務員笑臉迎人，把我推到行李接領處，接了行李叫我太太一同走貴賓道，細心地將我的護照遞給櫃枱蓋章，然後又從特別通道引導我們送到機場出口，一路上走走停停，沒有倦意，毫無怨言。與在亞庇遇見的那個行色倥偬的服務員，眞是天淵之別。

回程時遇到的輪椅服務員，態度一樣溫文爾雅，入柵前就推着輪椅找人了。我看看時間，離起飛時間尚有一小時，我說到入柵我才「入座」，因爲入柵要走相當遠，經過電梯到下層。「好吧，等會再來。」說完留下輪椅走開，不見了人影，我心暗忖：或許「一去不回頭了」。不禁自責。

等着等着，擴音機播放入柵時間到了，我和太太站起來，一轉身那個服務員忽地出現了。他叫我坐上去，優悠地推着輪椅越過許多人群，進入候機部，經過洗手間時，我覺得有點急，欲起身走進去，他連忙說「不必不必」，直接將我推入殘障人廁所，隨手把門掩上。他守候一個殘障人士，如同一個護士守候病人，有耐心，有服務精神。

相同是A航，在國內與國外的管理差異，單就對待殘障人士即產生兩種極端，除了實行「一國兩制」，再也沒有其他好解釋。

關於韓南先生

段懷清

北京時間四月二十八日上午，我收到美國韋斯利學院東亞系主任魏愛蓮教授郵件，告知韓南先生去世消息。郵件中還描述了魏教授在韓南先生去世前一周去探望他時的情景，說當時韓南先生兩眼已不能視人，且只能卧床，病重已近半年，還說「我爲他感傷不已，但我確信他已經做好了離開的準備。」（I'm feeling very sad about him, but I do think he was ready to go.）

接到郵件之後，我即草擬了一段韓南先生去世的文字，通過微信發布在朋友圈中。這段文字全文爲：頃接美國韋斯利學院東亞系主任魏愛蓮教授電郵，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哈佛—燕京學社第五任社長、著名中國文學研究家韓南先生，昨日在美去世。此消息隨即被我的同事張業松教授轉發。業松幾天之後告訴我，說我發布的那條韓南先生去世的消息，是國內首發，短短幾天之中，被點擊閱讀了十數萬次。我知道韓南先生在中國擁有一定數量的讀者，但沒有想到數量如此之大。而我當初之所以發布這條消息，也就是爲了這些讀者。

隨後因爲忙於雜事，原準備寫一篇追憶韓南先生的文章的計劃，也被擱置一邊，直到今天讀到業松轉發的艾朗諾、陳毓賢夫婦的文章《我們所認識的韓南教授夫婦》（《東方早報·上海書評》，二〇一四年五月十九日）。讀完此文之後，我決定將心中一直在想着的這篇稿子寫出來，算是對韓南先生的緬懷與追憶。

我與韓南先生從未見過面，我們之間的聯繫，一直是通過電子郵件。與韓南先生通郵件時，我曾想像過他生活的樣子，但終究隔着太平洋，又因爲年齡，韓南先生便一直在模模糊糊當中。現在他去世了，倒清晰起來了，直走到我心中，坐在那裡，不走了。

魏愛蓮教授說，韓南先生儘管退休了，但在哈佛—燕京學社還保留有一間工作室，而且還一直在繼續他的學術工作。今天讀到艾朗諾、陳毓賢夫婦的文章，對於韓南教授去世前的工作情況有了更多了解，也心生許多感念。昨晚一個餐聚會上，說到復旦中文系不少退休教師「退而不休」、筆耕不輟，退休之後煥發出學術第二春。陳思和老師說，中文系的人，寫作已經成了習慣，一旦習慣丟了，生命大概也就差不多了。而據悉韓南教授在他去世前一天，還在惦記着將他剛剛出版的譯著寄送友人——他將寫作的習慣，一直延續他生命的最後一刻。

這讓我想到與韓南先生有聯繫以來的些許往事。

我與韓南先生建立聯繫，得益於魏愛蓮教授的介紹。魏教授是韓南先生的入室女弟子，多年前當她得知我的研究興趣之時，就說你應該找機會去見韓南先生。再後來，又說你應該盡快找機會去見韓南先生。魏教授說韓南先生身體很好，但多年來一直在照顧患有帕金森氏綜合症的夫人，而學術研究工作又一直未曾終止。上了年紀的人，還如此辛勞，不免傷身。也就在這個時候，我應浙江大學學報之邀，爲其主持過一個「晚清文學研究」的專題。受邀之初，我就想到韓南先生。如果能得到韓南先生支持，自然是榮幸之至。沒想到經魏教授代爲聯絡後，韓南先生很快郵件回覆，並發來了他發表在《哈佛亞洲研究學刊》上的一篇論文，告知此文已獲得學刊授權，可在中國翻譯發表。這就是後來發表在《浙江大學學報》「晚清文學專題」中的《作爲中國文學文本之〈聖經〉：王韜與〈聖經〉「委辦本」》一文，翻譯之事是由我擔當完成的。

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韓南先生在此文翻譯過程中的認眞、仔細和嚴謹，以及對後輩溫和如春風般的鼓勵提攜。我至今保存着爲翻譯事與韓南先生之間的往來郵件。韓南先生的《聖經》「委辦本」研究最爲引人注目的成果有兩點，一是仔細考察《聖經》「委辦本」作爲中國文學文本的轉換生成過程，以及在此過程中所確立的翻譯原則和譯文風格；二是仔細考察作爲「委辦本」聖經重要譯者的王韜此間之宗教信仰或精神思想狀況。前者相關成果，已經見諸韓南先生那篇在《浙江大學學報》發表的長文，後者則有韓南先生在英國首次發現的王韜的一封英文信。韓南先生認爲，此信是王韜寫給他的精神導師、墨海書館的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的。在此信中，寫信人明白無誤地表白了自己對於基督教的信仰，並提出受洗申請。後來這封信也由我完成翻譯，發表於《清史研究》上。

在上述兩文翻譯過程中，韓南先生叮囑我兩文一定要都能翻譯發表出來，因爲韓南先生的論文與這篇他發現的王韜受洗申明之間，有着密切的學術關聯。儘管後來因爲學報體例緣故，這兩篇文章未能一併發表，但最終看到心願完成，韓南先生還是相當欣慰。我不清楚這兩篇文章，是否爲韓南先生去世前在中國最後公開發表的研究成果。但對我而言，這兩篇文章，顯然爲我之後的工作，指明了值得跟進的方向。

因爲上述緣故，我與韓南先生的聯繫一直保持着，儘管中間時有中斷，但並未終止，直到他去世前病重。至今記得爲了我的王韜研究，韓南先生從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下載發來《養心神詩》電子書。這份文獻，也成了我了解墨海書館時期的王韜與傳教士及基督教之關係的重要參考。而更讓我感念唏噓不已的是，這份文獻是韓南先生了解到我的工作之後主動發來的。

這中間，我還不時從魏愛蓮教授那裡，獲悉一些韓南教授日常生活方面的消息，大抵與艾朗諾、陳毓賢夫婦的文章中所述相近。年前，我申請哈佛—燕京訪問學者項目，今年初，接到哈佛—燕京方面通知，申請已被接受，並計劃於今年八月赴美。我將此消息郵件告知韓南先生，未見回覆。

我不知道那時候韓南先生已經病重多時，而且兩眼已不能視人，並掙扎於床榻之間……

我以爲這是我能夠想像到的韓南先生生命最後時刻的一幕情景，但艾朗諾、陳毓賢夫婦的文章，徹底顚覆了我的想像，讓我知道，直到其生命的最後一刻，韓南先生依然是一個學者，而不僅僅是一個生命垂危的病人。

水木清華（攝於西湖）　貝莉莉

謠言眞假

自由談

梅桑榆

本文擬題，恐令讀者笑，謠言者，虛構捏造之言也，何來眞假之分？然而，於「假作眞來眞亦假」之奇妙社會，謠言往往卻有被當作不容置疑之眞言而廣爲傳播的威力，膽敢質疑者反而要倒霉遭殃；而眞話卻往往被斥爲謠言，說眞話者反而要挨整或被請進號子房，數十年來，例證多多，故謠言往往撲朔迷離，令人難辨眞假。

遙想當年，「萬歲」之聲震天動地，人活一萬歲，乃至萬萬歲，當然是睜眼胡扯，但誰膽敢質疑，就要遭殃，某人在大家振臂高呼「萬歲」之時，小聲嘀咕了一句「人怎麼可能活一萬歲」，竟被判了十年徒刑。如果這種胡扯，是崇拜之情的表露，是衷心的祝願，那麼言之鑿鑿地稱「經北京醫學界檢查，偉大領袖能活到一百五十歲以上」，則是地道的謠言。但這則謠言卻被當作「激動人心的好消息」傳遍大江南北，且令許多人信以爲眞。誰若膽敢當衆表示懷疑，恐怕要被誓死捍衛偉大領袖者當場砸爛他的狗頭。糧食畝產超萬斤，乃至超十萬斤，是不折不扣的謠言，但經權威報紙頭版刊登，權威科學家撰文論證畝產的確可達數萬斤，連英明領袖也表示相信，草民們誰敢說假？於是天大的謠言就變成不可否認的事實。

時至今日，謠言之眞假更加奇詭難辨。有人向中紀委舉報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局長劉鐵男涉嫌學歷造假、巨額騙貸和包養、威脅情婦等問題，國家能源局迅速通過權威媒體闢謠，稱舉報者「純屬污衊造謠」，並威脅說：「我們正在聯繫有關網絡管理部門和公安部門，正在報案、報警。將採取正式的法律手段處理此事。」然而數月後，劉鐵男竟被雙規，謠言又變成了事實。有人向中紀委舉報華潤集團董事長宋林包養情婦，並涉嫌巨額貪腐，宋林隨即發布聲明闢謠，稱王志文：「舉報內容純屬捏造和惡意中傷。希望有關上級機構及相關部門盡快進行調查，本人亦將通過法律途徑對一切造謠誹謗人士及機構追究民事及刑事責任。」但具有戲劇性的是，中紀委第二天就在網上公布「宋林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劉宋二傢伙若不被中紀委查處，不明眞相者看了他們義正辭嚴的聲明，就會認爲舉報者是無中生有，造謠誹謗，而羅王二人也可能因造謠誹謗而被追責。此類故事，近年可謂多矣。

縱觀上述諸例，在謠言的眞與假，有一個明確的界定：無論對於官方還是個人，只要有利於己者，儘管是憑空捏造，原胡說八道，都是眞話、眞事；不利於己者，儘管是有憑有據，事實確鑿，都是謠言，都要「闢謠」、否認，或打擊散布者。而謠言之所以能夠成事實，事實之所以能夠成謠言，在於對眞相的掩蓋是否嚴密，以及掩蓋眞相者是否持絕對強勢。誰有能力將眞相掩蓋得嚴嚴實實，無人能知，就可毫無顧忌地造謠，並且令人信以爲眞，或不敢不信；而誰具有揭穿眞相的能力，或得到強勢一方的支持，使企圖掩蓋眞相者無法得逞，他說出的事實才不會變成「謠言」。

俠客情結

文化經緯

王兆貴

有一位性情文靜、氣質儒雅的朋友對我說，他年輕時不僅特喜歡武俠書籍，還有着強烈的俠客情結，熟悉他的人都不相信。於是，他就給我講述了他的一些人生遭遇和想法。

小時候，父親過早離開人世，孤兒寡母的家庭生活艱辛不說，有時還要遭受別人的冷眼和慢待，這讓他在傷心的同時非常氣不過，一股子本能的打抱不平的念頭，開始在他幼小的心田裡萌生。每當看到老實人被欺侮，他就會想，如果我從神靈那裡獲得了懲惡揚善的寶器或者是掌握了一門獨家功夫，一定要修理和教訓那些欺負弱者的無賴。長大後，又見不得危害社會公平的無道行爲。面對一些不公平的社會現象，他就會想，假如有一天自己成了氣候，一定要用手中的權力，使壞人遭殃，爲好人出氣，讓正義得到伸張。這種情結一直伴隨他走過不惑之年，才由於世俗的無奈而消解。

我雖然看過一些武俠小說，尤其喜歡金庸的作品，但總感到那是成人的童話，虛幻縹緲而不可信。起初對俠客情結到底是怎麼產生的，並沒有給予關注和理會。當我回顧並梳理自己年輕時的心態，並對人生進行一番現實的觀照時發現，俠客情結多半產生於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中，與俠義行爲不是一回事，與體魄和性情也沒有必然聯繫。強健的體魄和剛烈的性情有可能產生俠義行爲，不一定會產生俠客情結。體格柔弱、性情溫和的人往往容易受到欺侮和傷害，內心非常嚮往改變命運，找回自己做人的尊嚴。所以，越是處於弱勢地位的人，越容易產生俠客情結。因爲弱，最見不得恃強凌弱的行爲；想打抱不平，又沒有超越對方的地位、本錢和氣力，於是就夢想成爲一名行俠仗義的好漢；好漢做不成，就只好把俠肝義膽埋藏在自己的心裡。

中國人的這種俠客情結源遠流長，由正史、野史及民間傳聞所演繹的俠義故事和樹立起的俠客形象深入人心，並形成了一種富有傳奇色彩的「任俠文化」，映射出來的是憎愛分明的價值取向和扶弱助困的人文生態。但是，即便在具備生長條件的社會裡，也只有武功高強、膽略超常的人才能施展俠義行爲，潛在於普通人心中的不過是對不平現象的憎惡，對正義力量的期待，對俠義人格的讚許，這大約就是所謂的俠客情結。

黑瓦覆頂文淵閣

許揚

文史叢譚

在經過了數十年的塵封後，去年四月底，北京故宮博物院文淵閣開放迎客。文淵閣位於紫禁城東路，即故宮東華門內文華殿後，原明代聖濟殿舊址，明朝的內閣就設在這裡。

清乾隆三十八年，皇帝下詔開設「四庫全書館」，編纂《四庫全書》。次年又下詔興建藏書樓，命於文華殿後規度適宜方位，創建文淵閣，用於專貯《四庫全書》。

文淵閣仿浙江寧波范氏天一閣構置，閣前有水池，起到防火和區隔火種的作用。閣後湖石堆砌成山，東側建有碑亭，亭內有石碑，正面鐫刻有乾隆皇帝撰寫的《文淵閣記》，背面刻文淵閣賜宴御制詩。

中國封建社會等級森嚴，在建築上表現得更加突出。從屋頂、台基、面闊間數、斗拱、紋飾到宮殿的顏色等，都有嚴格的高下之分。紫禁城作爲中國明、清兩代二十四個皇帝的皇宮，「紅牆黃瓦」更是其建築等級「至高無上」的標誌之一。

明清兩朝規定只有皇帝的宮室、陵墓及奉旨敕建的壇廟才能准許使用黃琉璃瓦。古人認爲，五行與五色和五方是聯繫在一起的，木火土金水與青赤黃白黑和東南中西北相對應，黃居中間，故以之象徵爲帝王所重視的「中正」、「中庸」、「中和」之德；同時以之象徵帝王位居中央、統攝天下。古代帝王以五色土築社稷壇，東方鋪青色土，南方鋪赤色土，西方鋪白色土，北方鋪黑色土，中央覆蓋黃色土。分封諸侯時，到壇前舉行儀式，封於某方，即從壇上取某色土一把，授予新封諸侯。但中央的黃色土萬不可授人，因爲它是皇權的象徵。

文淵閣雖然地處紫禁城皇宮裡面，但它不同於故宮的其他宮殿建築，是專門爲藏書而建，防火是第一位的，所以即使位居紫禁城內亦不可「紅牆黃瓦」。故宮專家解釋，傳統觀念中黑色主水，文淵閣選黑綠色琉璃瓦覆頂，喻以水壓火，可保藏書樓安全。

當時，文淵閣的建築仿效了寧波天一閣。天一閣是明嘉靖十一年進士范欽退休後，在家鄉寧波建立的一座私人藏書樓。文淵閣雖沿襲了天一閣「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寓意，但在規模和形式上又進行了「皇家風範」的改造。其構造爲水磨絲縫磚牆，深綠廊柱，菱花窗門，歇山式屋頂，上覆黑琉璃瓦，而以綠琉璃瓦鑲簷頭，營造出皇家藏書樓典雅靜謐肅穆的氣氛。閣前還開鑿方池，池上橫跨石橋，池中引入金水河水。此外，文淵閣與天一閣最主要的差別還在於天一閣是上下兩層，文淵閣則採取「明二暗三」的建造方式，即外觀看上去重簷兩層，實際上卻利用上層樓板之下的腰部空間，暗中多造一個夾層，全閣共有上、中、下三層。

按照古人的「五行八卦」之說，「北方壬癸水，其色屬黑」，黑代表水。文淵閣是貯書之所，書忌火，以黑瓦爲頂，寓含着「以水克火」之意。而窗柱等不飾紅金等暖色也有這一層用意。關於藏書閣的命名，也有其深邃的文化內涵，乾隆從文化上賦予其不同尋常的深層涵義。除紫禁城中的文淵閣沿襲明代之稱外，其他三閣均由乾隆帝分別命名爲文源、文津、文溯。此即「四閣之名，皆冠以文。而若淵、若源、若津、若溯，皆從水以立義者，蓋取范氏天一閣之爲」。即以文淵閣爲代表的內廷四閣之名，皆取法天一閣，體現了以水克火的理念。